文章编号：1673-9493（2016）03-0035-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跨国境地区合作机制研究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王昆
Wang Kun

摘要：本文首先选取了美墨、欧盟、南部非洲三种具有发展阶段差异、经济水平差异、政治背景差异的跨国境合作地区，分析了这些跨国境地区合作的进展与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跨国境地区合作的合作原因与合作动力，归纳跨国境地区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1) 跨国境地区的合作动力可归纳为五种——经济联系建设、地缘安全保障、国际环境塑造、自然 / 社会系统保护、跨境资源开发；(2) 在动力机制上，虽然这五个方面是跨境合作的最主要合作动力，但是在不同案例中重点差异非常大；(3) 不同合作重点下，会在实际合作中产生不同的合作模式并直接影响到合作的成效。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case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at var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tage,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ontext, i.e. Mexican-US, EU, and Sub-Sahara Africa.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se cross-border regional cooperations are analyzed, which leads to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cause and momentum of cooper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1) the driving for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ive aspects: building economic ties, providing geopolitical security,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eserving natural/social system, developing cross-border resources; (2) these five mechanisms, albeit the primary impetus for cooperation, show important variances in focus of different cases; (3) difference in cooperation focus will generate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and will have an direct impact upon the effectiveness.

关键词：跨国境地区；地区合作；动力机制；模式差异

Keywords: Cross-border Reg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Dynamic Mechanism;Variance of Pattern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城镇群类型识别与空间增长质量评价关键技术研究（2012BAJ15B01）

作者：王昆，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

引言

当前跨境地区合作面临着国际、国内、地区等多重背景。国际层面上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国内层面上有国家边疆建设的大背景，地区层面上各个沿边地区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诉求与发展意愿。

我国的跨境合作理论研究开展的时间虽然较长，但研究以经贸为主，社会文化为辅，特别是对于跨境地区城镇研究不足。我国学者对国外跨国境合作地区也进行了部分研究，但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受语言因素限制，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以欧洲、美墨地区为主，对于欧盟跨境地区，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当前在各种跨境合作形式下的具体合作策略，例如探讨如何在跨境合作中实现区域城镇的发展带动；而对于美墨跨境地区，主要集中于其跨境合作对边境城镇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用及未来应采取的方向。除了这二者之外，还有少量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境地区（如非洲南部地区）合作进行了研究。

1 跨国境合作的动力类型

跨国境地区的合作是一种客观现象，其出现、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特征。虽然在跨境合作中参与者众多、牵涉因素多样、合作方式不断创新，但是“为什么要进行跨境合作”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相关学者研究中跨境合作的动力类型可归纳为以下五种。

（1）经济区联系的动力

从经济学来说，边境开放与否造成的距离—成本关系的改变是促使地缘经济区走向开放的主要原因。以奥古斯特 · 廖什（August Lösch）和约翰 · 海利威尔（John Helliwell）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边境增加了边境成本，例如，在《区位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1954*）中，廖什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与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相比较，边境地区存在一种成本。他将“边境”等同为“距离”，边境造成的边际成本有可能等同于成千上百英里的成本 [1]。海利威尔用加拿大边境地区为例，证明了即使在经济一体化地区，对于边境地区的人和公司而言依然还有边际成本，更进一步的，他证明社会经济网络比预想的更强大，边境两

侧的的经济交往仍然特别重要、不可替代[2]。其他的经济学家，例如博伊丘克（Boychuk）和基纳滕（Van Nijnatten），在文章中讨论了经济一体化是否会进一步带来边境两侧政策的趋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越高，政策趋同就越明显；政策趋同越明显，政治一体化水平就越高。他们的结论表明了经济力量对于边境的作用。

（2）地缘政治安全的动力

在民族国家出现的早期，国家对于边境的认识还局限于“领土边界”这一狭义理解，各个国家都只负责自己边境一侧的安全稳定，这一做法即使到了近代也广泛存在。这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跨境犯罪、贩毒、枪支流动、人口偷渡、货物走私等现象在边境地区广泛存在。边界带来的管理系统分割使得这些现象很难得到抑制。

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国家安全系统所维护的最大利益就是要保证自己国家的领土不受外来力量侵犯。传统安全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与军事安全为主、国家安全至上、通过武力与战争方式解决冲突与矛盾安全观念。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的明显特点。因此要想控制边境地区的政治格局稳定，就必然要进行跨境合作，联合边境两侧国家的力量，对边境地缘政治稳定进行治理。

（3）国际环境的动力

国际环境是指能影响一国生存、发展的所有外部因素总和。这种环境既包括了军事形势、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也涵盖了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科技革命的潮流。在《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杂志中，杰拉尔德·布莱克（Gerald Blake）对“边境功能区域化”给予关注，他认为，“不久以后，传统民族国家那种五颜六色的、马赛克式的政治地图将变得没有意义，它将被更大的政治经济集团所取代，这些政治经济集团是依靠内部和外部的边界进行划分的。”[3]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跨境合作可以进行文化影响力的扩张，通过这类“身份认同”可以对区域控制能力进行巩固[4]。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5]，因此，如何通过文化认同、价值认可等方式取得更广阔的国际环境，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面构筑健康的、具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关系成为当前各个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

（4）跨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联系的动力

伴随跨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多样性）恶化，在跨国境区域尺度解决该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受到重视[6,7]。这种整体保护观与以往分流域保护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其必然带来更多种管理主体参与[8]，并有助于跨境生态走廊的形成。

跨境人文社会联系则是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认识。许多学者都认为，政治边界从来没有与社会和文化边界相一致的，因为社会和文化是流动的、复杂的、重叠的，很少会严格按照地理边界的。边境经常从现有的民族网络和亲缘网络进行切割开，使得跨境人文社会非常复杂，国家文化特征与民族特征共存[9]。因此，在处理跨境自然环境及跨境人文社会问题方面，例如，处理国际河道水体污染治理、国际河道开发利用、跨境民族文化保护等事务时，都应该考虑实际的联系情况，不能局限于“有形的国家边界”，而应该顺应这些“无形的联系”，在边境两侧共同实施。

（5）资源开发的动力

边境的防御作用与资源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悖论。一方面，边境是一个国家文化区域与另一个国家文化区域的分割线，在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稳定的考虑，为了能更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都会对这一地区进行“阻隔”，因此在过去很长的历史中都在资源开发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边境地区又有着比较大的资源，如能源、矿产、动植物等。如果进行跨境合作，就能够把这些资源都利用起来。

2 三个典型的跨国境合作地区的动力机制分析

欧洲地区、美国墨西哥跨境地区、南部非洲地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跨境合作类型。欧盟的跨境合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欧盟内部边界跨境合作，另一类为欧盟外部的边界跨境合作，欧盟跨境合作的目的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基、文化根基，并且建造没有边界的大欧洲”①。目标是降低内部边界以改善一个市场的情况、通过凝聚在一起又可行的区域来提高竞争力、通过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协调促进社会凝聚力[10]。美墨边境在 1983 年按照拉巴斯协议设定的官方边境区域——200 km 宽（边境线每侧 100 km）的区域，这个地区被称为“第三个国家”或者“永远的中间地带”[11]。南部非洲国家从 1970 年代开始进行跨境合作，其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南部非洲发展协调组织”（SADC）包含的国家中，其面积总和达到 928 万 km^2，人口为 1.8 亿。按照边境两侧经济发展水平，上述三个跨国境地区代表了三类不同的合作：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跨国境合作、发达地区—落后地区跨国境合作、落后地区—落后地区跨国境合作。

2.1 欧洲跨境合作动力机制

跨境经济区的体现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这是欧盟跨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1990 年，欧盟出现了 30

① 参见 http://www.aebr.net, October 14, 2009。

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到了 200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73 个[12]。现在欧洲区域内部各个国家的边境几乎都被跨境经济合作区覆盖，通常称之为“Euroregions”、“Euregios”或“Working Communities”[13]。

地缘安全的体现为边境地区的衔接。欧盟跨境合作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边境稳定达到新老成员国在边境地区的熟悉与衔接。这种“边境稳定”既包含硬件方面（基础设施）也包含软件方面（共同规划与管理），且以前者为重点[14]。

国际环境的体现——优势扩张。欧盟通过跨境合作，在国际环境方面实现“稳定、安全与福利”及“优势扩张”[15]。欧盟对于外部边境所采取的跨境合作主要目的是为欧盟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以便能确立并扩大共同政治经济利益。

欧洲通过跨境合作，发挥社会文化的作用，加强共同认同感与跨界文化。欧盟注重跨境合作中的文化认同感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欧盟早期跨境合作的困难使得其转变了合作方向，寻找新的跨境合作突破口。2000 年以前的跨境合作被看作是“缺乏有效治理经验、边境整合经验与建设经验”[14]，同时由于这种质疑，很多学者试图从理论研究寻找欧盟进一步发展的途径[16]，强调通过仔细分析个体和组织这两个层面的目标、恐惧、威胁、身份、文化和其他因素，以此来分析国际关系。总体而言，欧盟边境合作中开始将关注点集中于精神层面的认同，例如共同价值、共同身份、文化认同等。二是随着跨境合作的进行，边境地区文化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欧盟的跨境合作目标是创造无边界的欧洲，即消除地理边疆，但是“文化的边疆”并不是能够消除的，反而可能会在跨境合作中被强化。“一体化带来的是欧盟内部地里边界和官方边界的逐渐消隐，而隐形的文化疆界却在复活。”[17] 此外，在欧盟的部分边境地区，由于文化、种族等相似性，在发展中形成了共同发展、要求自治的意愿[18]，这些地区的存在也是促进跨境合作转向边境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欧盟的跨境合作强调从共同文化、共同认同感，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是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由于选取案例的不同，研究得出的观点侧重点差异很大[19]。

欧盟通过跨境合作减少边境效应，促进边境资源的开发效用。目前的边境资源开发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等内容。

2.2 美墨跨境合作动力机制

美墨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是跨境经济合作的基础。在边境地区，现代墨西哥经济依赖美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移民和组装工厂（即边境加工厂）。这两者都是由于边境创造了机会使得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到这个地区。因此，这种经济的不对称性是美墨跨境合作关系的核心[20]，但另一方面，美墨跨境经济区两侧的差异性对边境两侧都形成了负面溢出效应。

美墨地缘安全合作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下的典型代表，同时与国家能源安全密切相关。由于美墨两国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社会，为非法移民、毒品、枪支走私等“非法贸易”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供需关系。因此，美墨在边境在地缘安全问题方面开展了大量合作，例如共同设立“职能边界”、资金援助、建立边境执行督导委员会、缉毒执法合作、政府和情报人员合作等。此外，美墨之间因能源而长期合作紧密。因此，从地缘安全利益来看，美墨的跨境合作既有针对边境安全稳定的考虑，也有能源战略角度的考虑。

美墨跨境合作中，自然环境治理是跨境合作出现的契机。早在 1930 年，提华纳和圣地亚哥就发现它们享有共同的生态领域，最明显的是地区水文和排水系统的分水岭。1960 年以后，伴随美墨贸易自由化，边境地区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速度越来越快、跨境交通量不断增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因此，1990 年以后，在跨境合作中，对跨境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主要策略是增加环境基础设施，以满足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求，如控制空气污染、提高环境卫生水平、改善废弃物管理能力、提高水质、增强废水处理能力等。并提出了时效为 10 年的“美墨边境 2012 计划”（The Border 2012 Program）[21]。

美墨跨境资源开发主要针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近些年由于墨西哥石油储量下降，美国石油增长，两国开始开发一直都充满争议的领海边境线上的石油资源，这里蕴藏着 1.72 亿桶石油和 3 000 亿 m^3 天然气资源。为了能够达成协议，双方在此方面的跨境合作更加广泛。

2.3 南部非洲跨境合作动力机制

南部非洲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体”）跨境合作中，经济作用体现得不明显。南共体的发展重点是以发展为导向的一体化，该区域合作的初始目标并非建立共同的市场，而是为未来发展考虑“发展基础问题”，然后再进一步考虑经济的发展。早在 2003 年，南部非洲各国领导人即授权南共体制定《地区战略发展规划》，以此作为南部非洲地区一体化与发展的蓝图。该规划几经审议和修改，确定了一些优先发展领域，诸如贸易和经济自由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平与安全、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粮食安全、艾滋病及其他传染病防治、跨界自然资源管理等①。

① 参见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4-08/25/content_7177821.htm。

南共体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森林砍伐、土质下降、海洋资源、水资源及空气水质的恶化[22],在过去几十年里，南共体成员国在加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编纂了大量新的环境法律及规章，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23]。

南共体体现的是以和平稳定为基础的地缘合作。目前南共体在地区安全方面，更多是关注于生活稳定，例如解决当前贫困问题等，而非军事方面的防务[24]。以此为出发点，南部非洲在共同安全方面的主要策略力包括：共享跨境信息、共享情报和信息资源；加强集体安全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地区维和力量；对冲突进行预防、控制、解决。

南部非洲主要通过跨境合作实现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转型。南部非洲以往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25]——虽拥有丰富矿产和农业资源，但绝大多数资源都以廉价的原材料形式出口，民众受益甚少[26]。“南部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在新一轮“淘金热”之后，将给他们留下什么。”[27] 很多非洲国家安全的问题不是缺少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而是贸易结构不合理，即用廉价的原料换取高附加值的工业品，甚至是食品，因此南部非洲的发展战略是把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多样化相联系。

3 跨境合作动力机制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一般性的跨国境合作动力类型分析，以及三个典型跨国境合作地区在这些动力方面的具体表现，本文认为国际上跨国境合作呈现出以下动力机制特点。

（1）多种跨境合作动力一般同时存在于跨境地区合作中

例如在欧盟跨境合作地区，其经济区、地缘安全、国际环境、自然环境、资源开发这五个方面的动力都得到了有效的证实；在美墨地区，跨境合作也影响到跨国经济区的联系、地缘安全、资源开发和自然环境治理；南部非洲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体现了这些因素。这些结果表明多种跨境合作动力一般会同时存在于跨境地区合作中，并且跨境合作确实可以同时会促进某个或多个方面的发展。

我国跨境合作思路的转变需要对跨境合作有正确的定位。我国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对于边疆地区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边疆稳定，并试图通过资金、政策方面的优惠来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联系与交流成为我国的发展的重要途径，边疆地区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门户”，其特殊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已有的边境发展战略中，如云南的“桥头堡”战略、东北“以我为主”总战略下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等，这些跨境合作战略的提出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包含了经济、技术、文化、环境、资源、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但是这些合作的提法目前还比较泛，缺乏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支撑。这些合作的项目，哪些能短期开展的，哪些是需要长期培育的，哪些是不可能实现的，哪些是可以实施彻底满足国家战略的，哪些是只能在局部展开不能推广的——都没有完整的论证过程。因此在未来边境规划建设中，应结合每段边境的特点，探讨多种跨境合作渠道的可能性。从而形成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城镇发展的综合模式。

（2）跨境合作动力在不同跨境地区的差异性很明显

由于跨境地区自身存在差异，使得并非所有动力因素都能够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在欧盟跨境合作地区，由于边境两侧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不同，跨境社会系统的建设成效并没有一致的结果；在美墨地区，虽然跨境自然环境是其合作的原因，但由于两边行政、经济水平等方面的阻力，跨境环境治理的实际成效进展缓慢，资源开发方面，双方更是由于技术实力、利益分配等问题使其长时间搁置；南部非洲地区跨境合作的目的之一是结成“更加稳定的安全同盟”，但是由于其中一些国家发展水平有限且在政治目的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使得其地缘安全合作与国际环境建设发展一般。这表明，虽然多种动力因素同时存在，但是何种动力能最终实现“合作成功”的目标是有差异的。

在我国边境应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例如，云南边境的文化认同性、自然生态协同保护、流域资源开发等却有很多优势，如果在这些方面开展工作，将会大大促进跨境合作的进展与成效，而这些优势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是被忽略的，发掘每段边境的“独特优势”，从而找到契合该段边境发展的“动力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国在进行跨境规划时也应该找到合理的切入点，可能是经济贸易，可能是文化沟通，也可能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边境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目的。

（3）跨境合作中，部分动力的体现具有一定局限性

跨境合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一些方面的发展，但是其合作成效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使得部分合作动力只能部分选择性地体现出来。在一部分跨境合作中，某些“初始动力”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其跨境合作假说只停留在理论评述的水平上。例如美墨跨境地区，由于边境两侧本身文化差异很大，跨境合作并没有带来跨境文化的融合，反而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南部非洲地区由于相邻国家之间的经济都比较落后，难以在边境地区形成良好的跨境经济地区发展。

我国的边境建设也应该有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虽然边境地区在两国之间占据了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边境地区都可以成为两国开展交往的“热闹舞台”。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边境另一侧的经济发展水平常常并不高，从

而导致了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例如我国自 2002 年就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我国云南边境地区的众多口岸中仅有少数口岸如瑞丽口岸、河口口岸发展迅速，其他一些口岸如南伞口岸、清水河口岸、金水河口岸发展极慢，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面临诸多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我国与东盟十国之间有大量的贸易，但是由于海运等原因使得新马泰等国的贸易主要与我国沿海省份联系，而我国云南省份的贸易主要与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开展，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想让云南边境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的“经济窗口”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对我国的跨境合作应采取何种模式、何种切入点要有科学的认识。边境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同时存在，国际已有的区域合作经验表明，经济合作只是跨境合作的一个方面，并不能达到“全面合作”的目的，如果处理不好其他方面的协调，经济合作甚至会带来新的冲突与争端。

（4）不同限制条件下，跨境合作动力会让跨境合作进入不同的合作深度

例如南共体的跨境合作，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如果成员国不积极地回应、支持，那么位于纳米比亚的秘书处就很难有所作为，只能如同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28] 美墨边境的跨境合作尽管多种动力并存，但合作成果主要还是停留在经济合作方面，同时也对两侧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例如对墨西哥相关产业的冲击 [29]；而欧盟的跨境合作在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多方面均取得成效。欧盟的跨境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等性保证了这类跨境合作深度开展的可能性，同时较高的经济水平能确保跨境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家才会有精力关注边境地区的文化、自然等“非经济因素”，才会有深度合作的可能性。

我国的跨境合作亦将是一个长期谋划、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于国内一般地区政府力量主导的区域发展，跨境合作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建设的过程，期间涉及政治博弈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跨境合作不能一蹴而就，应该有长期的发展规划。特别是对于边境线邻近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近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扶持等手段改善其人居环境，中期和远期发挥其影响力，在更大的跨境地区形成良性的带动作用。UPI

参考文献

[1] Lö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2] John Helliwell. How Much Do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M]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1998

[3] Blake G. State Limit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Observations on Form and Function [J] .Geopolitics, 2000, 5(1):1.

[4] Syssner J. Conceptualization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Regional Policy [J].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2009, 19(3): 437-458.

[5] 塞缪尔·亨廷顿 . 文明的冲突 [M]. 周琪 , 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013.

[6] Grumbine R. What is Ecoystem Management? [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4,8 (1): 27-38.

[7] Szaro R, Berc J, Cameron S, Cordle S, Crosby M, Martin L, Norton D, O'Mallery R, Ruark G. The Emergence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as a Tool for Meeting People's Needs and Sustaining Ecosystem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0: 1-7.

[8] Margerum R.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Foundations for Successful Practice[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9, 24 (2): 151-166.

[9] Guillermo. Dangerous Border Crosser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0] Corey Johnson.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Europe: Room for More transboundary Space[J]. European Urban & Regional Studies, 2009, 16(2): 191-206.

[11] Miller T, ed. Writing on the Edge: A Borderlands Reader[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3.

[12] Natalie Chen. Intra-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y do National Borders Matte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04, 63(1): 93-118,.

[13] 杨海荣 . 欧洲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实践分析及启示 [J]. 对外经贸实务 , 2013, 08: 15-17.

[14] Martin Klatt, Hayo Herrmann.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Over 30 Years of Region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Within the EU: Experiences at the Dutch-German and Danish-German Border[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1, 26(1): 65-87.

[15] Natalia Shapovalova. The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Still-born?[J]. European Foreign Policies, 2009.

[16]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王昱 . 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 [J]. 国际观察 , 2000(06): 15-18.

[18] 钱智 . 试论国外区域科学研究的特点、问题及趋向 [J]. 北京大学学报 , 2001(01): 17-20.

[19] Donald Alper, Emmanuel Brunet-Jailly. Special Issue: Rarely Studiedborderlands[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1, 23(3): 1-7.

[20] 隋笑宇 . 美国东北部城市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 [D]. 东北师范大学 , 2012.

[21] Border 2012 US-Mexico Environmental Program Response Summary Report, 2002, 3.

[22] Dorm-Adzobu C.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Ecological in Africa[J]. African Environment Week Seminar, IFA-Nord Ostev,1997, 10: 5-12.

[23] 吴勇 . 经济手段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环境管理中的运用及启示 [J]. 西亚非洲 , 2011(9): 136-145.

[24] Greg Mills. A 21st Century Security Agenda: the End of "Defence" as We Know it?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AHA/IDSA Strategic Dialogue, 25-26 March, 1997.

[25] SADC Secretariat. SADC Annual Report 1997-1998 [EB/OL]. (1998-07-01) [2015-03-18]. http://www.sadc.int/documents-publications/show/1026.

[26] 曾爱平 . 南共体关注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J]. 瞭望 , 2014(34): 50-51.

[27] 杨立华 . 以发展为导向的地区一体化 : 南部非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希望 [J]. 西亚非洲 , 1999(1): 19-24.

[28] 慕容彦超 . SADC :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EB/OL]. (2011-09-16) [2015-03-08].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109/16/t20110916_22700985.shtml.

[29] CG Gonzalez, 郭蕾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的良好范例吗 ?——来自墨西哥和美国的经验 [J]. 江西社会科学 . 2009(5):244-252.

（本文编辑 : 许玫）